

齐鲁传统文化中的 廉政思想

中共山东省纪委宣传部 编
孟祥才 著

廉

齐鲁大地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唯一发源地。

在这里尧、舜、周公、管子、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联翩而至确立了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基本内涵。

此后，齐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一代接一代，子孙绳绳，锲而不舍，继续为中国廉政思想添砖加瓦，做出了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毫不逊色的贡献，成为华夏历史天幕上永放光芒的辉煌星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齐鲁传统文化中的 廉政思想

中共山东省纪委宣传部 编
孟祥才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齐鲁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 / 孟祥才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209-09197-8

I. ①齐… II. ①孟… III. ①廉政建设-政治思想史-山东省-古代 IV. ①D69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3658号

齐鲁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

孟祥才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华立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26.5

字 数 420千字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

ISBN 978-7-209-09197-8

定 价 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 言

在中华文明一体多元的发展格局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同中有异、异中见同、多姿多彩、争奇斗艳的地域文化。如从三代到战国，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就形成了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草原文化、秦陇文化、吴越文化、楚湘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滇文化等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化系统。在这些地域文化中，只有齐鲁文化在秦汉时期完成了由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转化，其他地域文化只是作为文化的因子融入主流文化。从秦汉开始，齐鲁文化就是作为主流文化的核心部分存在和发展的，同时又具有同其他地方不同的地域特点，在各个历史时期继续为主流思想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廉政思想作为齐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她产生、发展、丰富和成熟的过程。

齐鲁文化发轫于东夷文化。

西周初年，周王朝通过大分封在今山东地区建立了齐、鲁两大诸侯国，标志着齐鲁文化区域的初步建立。西周时期的齐鲁文化是一种以周文化为主导，融合了夏商文化与东夷文化的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这一文化系统是由齐文化和鲁文化两个亚文化系统组成的。

《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述的五帝时期，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时期，中国历史完成了由野蛮向文明的转化。其中的舜是东夷族的首领，由尧之禅让而获得帝位（准确地说应该是部落联盟的首领），他建立了最早的国家行政机构，制定了法律，划定全国为十二州。伴随着行政权力寻租而导致的腐败的发生，刺激舜萌生了最早的“明德”、严法的廉政意识，促使他进行了最早的惩治腐败的斗争。夏朝建立后，生活在齐鲁地区的商族也在发展，当夏朝最后一个君王夏桀暴虐腐败导致民不聊生时，商族的首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推翻了夏朝的统治，建立了商朝，之后，他进一步发展了舜的廉政理念。

齐国的建立者是周朝的异姓贵族姜尚。他所在的氏族本是东夷人的一支，因而极易与东夷人找到文化上的认同。他在齐国奉行“因其俗，简其礼”和“举贤尚功”的治国方针，铸就了齐文化重实效、崇功利、举贤才、尚法治、扬兵学、倡开放的文化品格。春秋时期，管仲相桓公，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将齐桓公推向五霸之首的尊位。同时，管仲继续弘扬齐学的优长。他以“水本原论”展示唯物论的自然观，以“顺民心”和“上功富民”展示民本意识，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展示礼治和伦理观念。此外，他在法律、军事和外交思想方面也有许多创见，大大拓展了齐文化的领域，深化了它的内容。管仲之后百余年，齐国又出现了一个影响很大的政论家和思想家晏婴。他崇尚节俭，深自谦抑，提倡礼制，强调德化，要求维护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以及各色人之间的等级秩序，同时要求关心百姓疾苦，减轻对他们的剥削。在哲学上，他主张“和而不同”，批判神道迷信，显示了浓重的人文主义色彩。姜尚、管仲和晏婴共同打造了具有齐文化色彩的廉政思想。

在齐文化迅速发展并向四方传播之时，泰山之阳的鲁国孕育发展了颇具特色的礼乐文化。鲁国是周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国，而他正是周王室“制礼作乐”的始作俑者。这样，鲁国就成为周文化在东方最大的继承者和传播者。鲁国是各诸侯国中唯一可使用天子礼乐的国家。它从周王室那里得到了“祝宗卜史”等专职文化官员和相关的礼器与文物典册，所以春秋时期吴国季札访鲁时才有“周礼尽在鲁矣”的慨叹。鲁文化极力维护周

文化的纯正性，特别讲究道德名节，注重弘扬传统文化和阐发宗法伦理观念，由此孕育出鲁文化特征的廉政思想和他的三个代表人物周公、季文子和公仪休。

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公室沦落和贵族间斗争的日趋激烈，出现了“礼崩乐坏”和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这就促成了私学的勃兴和文化成果的传播。这种形势就为孔子这样的思想文化领袖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孔子以仁学与礼学交融互补，构筑了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一面大力提倡以重礼乐、倡教化、明等级为主要内容的礼学，同时又极力弘扬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爱人”“立人”“达人”的人文精神，强调人的道德自觉和主动求善的内动自律，推出很高的道德境界与人格理想，以仁民爱物和君子人格将廉政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他的天命观和鬼神论则充满了昂扬向上的主观能动精神。他整理的五经不仅为保存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立下不世之功，而且为儒家学派选定了最基本的思想资料；他创办私学，吸引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弟子，这一切就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广收门徒，周游列国，广泛传播儒家思想，加上其后学的努力，不但使儒学日益成为引人注目的显学，而且也为战国百家争鸣思潮的勃兴起了“金鸡一鸣天下晓”的作用。由于孔子站在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上将传统的政治与道德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因而给齐鲁文化注入了新的灵魂。有了儒家学说，齐鲁文化才真正具有了民族的、地域的超越性，才真正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

春秋时期，齐鲁诞生了两个著名的军事家司马穰苴和孙武，他们的兵学思想中也有着丰富的廉政意识，主要从兵家和将帅素养的角度丰富了当时的廉政文化。

二

战国时代是齐鲁文化的发皇期。这一时期，田氏代齐，标志着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齐威王厉行改革，使齐国成为经济和军事力量举足轻重的

东方大国。齐威王既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又是一位具有清醒廉政意识的英主，他对阿大夫和即墨大夫功过分明的奖惩，是廉政实践的经典之作。齐威王、齐宣王建立和扩大稷下学宫，礼贤下士，吸引大批列国学者前来讲学和研究，使齐国一时成为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心。百家争鸣中不少顶尖的学者，如孟子、荀子、宋钐、尹文、淳于髡、彭蒙、慎到、田季真、接予、环渊、邹衍、儿说、田巴等，都曾为稷下学派的繁荣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与此同时，日趋衰微的鲁国也在思想文化上创造了骄人业绩，出现了墨子、子思、孟子等思想巨人。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最大成就是造就了墨家学派、思孟学派、荀子学派、黄老稷下学派、邹衍的阴阳五行学派以及接续孙武兵学的孙臆兵学和吴起兵学，并以比春秋时期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向全国播扬。

墨翟创立墨家学派。他代表“农与工肆之人”，主张“兼爱”“尚同”“尚贤”“非命”“非乐”“节用”“节葬”“尊天”“事鬼”，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其中的“尚贤”“节用”“节葬”信条中蕴含着强烈的廉政理念。

子思和孟子创造了影响深远的思孟学派。子思是联系孔子和孟子的桥梁，他创造了“天道性命”“正心诚意”以及从“正身”“导民”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套理论。孟子宣扬“性善”，倡导“仁政”，主张“民贵君轻”，要求“制民恒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他还鼓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思孟学派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三代至春秋以来齐鲁的廉政思想，集中体现在“仁政”“民本”“举贤任贤”和“君子人格”的阐发。荀子创立的孙氏之儒虽然与孟氏之儒隐隐对立，但对礼教与德化的认识基本一致。荀子的“天论”集先秦唯物论之大成，“礼论”集先秦礼学之大成。他以舟水喻君民关系，援法入儒，主张礼法兼容，德刑并用，大大拓展了儒学的施政空间，给齐鲁廉政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孟子和荀子不仅大大丰富了儒学的内容，完善了儒学的体系，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了儒学和扩大了这一

学派的影响。

比孟子稍后的庄子是老子之后道家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庄子》一书尽管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持极其悲观的态度，但他对伴随着文明出现的腐败表露了特别敏感的警觉，是对廉政的悲怆的呼唤。黄老学派是不同于老庄学派的新道家，其思想主要体现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它主张“君道无为”、德刑兼用、减轻剥削，为百姓创造一个宽松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黄老之学后来一度被汉初统治者选为统治思想。

齐国的孙臆和鲁国的吴起，是孙武和司马穰苴之后蜚声列国的军事家，他们留下的兵书《孙臆兵法》和《吴子》中同样显露出独特的廉政理念。而鲁仲连为代表的豪侠之士，则以自己的侠义之行诠释了廉政深广的社会意义。

短命的秦朝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政策，窒息了百家争鸣思潮。又以“焚书坑儒”将知识分子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加速了灭亡的步伐。汉初推行黄老政治，虽然对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引来诸侯王坐大和豪强肆虐横行等弊端。于是汉武帝与董仲舒相结合，将儒学推上了统治思想的宝座。

秦朝统一以后，由于百家争鸣的结束，齐鲁之学面临全新的形势，每个学术流派为了自己的生存都在进行整合与改造。经过秦到汉初八十余年几代儒家学者的努力，齐鲁儒学发展成为当时势力最大、最具生机的学派，展示了较其他任何学派都无法比拟的优势：

一、它拥有一批经过整理的稳定的思想资料，如五经和《论语》《孟子》《荀子》《中庸》《孝经》等。

二、它拥有一批学识渊博、声望卓著的学者，他们或做官从政，或聚徒讲学，在政界和学界大大扩展了儒学的阵地和影响。

三、经过自春秋至汉初数百年的传播，齐鲁儒学早已突破地域界限，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乃至岭南、塞北、闽越、巴蜀的广大地区播扬，影响日益扩大。

四、经过数代儒家学者的不断改造创新，特别是经过董仲舒（他的出生地广川，位于今河北枣强县境，虽然在地域上不属齐鲁，但在文化区划上却是齐鲁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现在的山东省德州市就有董仲舒的“读书台”等遗迹）的精心整合，将齐学与鲁学的优长融为一体，儒学于是以全新的面貌赢得了汉武帝的青睐。这样，通过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热烈拥抱，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将儒学推上了主流意识的殿堂。这其中，太学的建立，经学官学地位的确立，从儒生中选取官吏制度的推行，使儒学的主流意识地位日益巩固。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学作为主流意识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

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对稳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它既获得了统治者的青睐，又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是中国宗法农业社会最适宜的意识形态。第一，儒学倡导大一统，鼓吹“内诸夏而外夷狄”，反映了中华各民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蕴含着深厚的爱国主义，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第二，它倡导尊君爱民，鼓吹等级秩序，“说忠孝，道中庸，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找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的结合点。第三，它提倡的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说，给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纱幕，反映了君、臣、百姓对伦理道德的认同。第四，儒学具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意识和博大深广的人道主义精神，蕴含着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既要求对百姓实行“仁政”“德治”，肯定“汤武革命”，又提倡“仁爱”“立人”“达人”“推己及人”，鼓吹以“爱心”和“亲情”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第五，它倡导“尽人力而听天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独立不移的大丈夫精神和操守重于生命的品格意识。第六，它一贯重视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第七，儒学具有开放的学术品格，能够不断从“夷狄”等异质文化中吸纳知识与智慧，以丰富、充实和发展自己。它不是一个自满自足、僵化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与时俱进的奋发进取意识的开放性的学派，因而能够在历史的前进运动中不断增强对社

会和人生需求的适应能力。第八，儒学具有实践性和普及性的品格。它没有故作高深的玄理，也不用晦涩难解的文字，其政治经济思想、伦理道德情操、人生价值理念，都是用比较贴近百姓的语言和司空见惯的事物表述的，因而能够润物细无声般地渗透到人们的心田之中，融化到人们的血液里，变成民族的文化基因。

董仲舒思想中有着丰富的廉政理念，如“德主刑辅”“限田限奴”“禁民二业”等。而秦汉时期的齐鲁儒生更是将传统儒学中的廉政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和弘扬。其中，公孙弘、主父偃、东方朔、贡禹、匡衡、左雄、郑玄、何休、徐干、仲长统等人的思想中包含着各具特色的廉政意识，董宣、刘宠、杨震的廉政实践也透出他们对廉政的认识和理解。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年）三个半世纪多的岁月，在经历了西晋短暂的统一以后，中国就进入了南北对峙、北方多民族政权并立互易、南方皇朝频繁更替的多事之秋。随着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汉族人口大量南迁和北方少数民族入主黄河中下游，在思想文化上就形成了多元并存和中外文化、不同地域文化以及儒、佛、道文化持续交流、互动和融合的局面。这一时期，在文化的传承上，自东汉末年崛起的世家大族起了重大作用。孔氏、琅琊颜氏、琅琊王氏、清河崔氏、泰山羊氏等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儒学尽管受到外来的佛学和由道学转化而来的玄学的巨大挑战，但它在政治上作为统治思想、社会上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并没有动摇。这一时期，齐鲁的经学家和玄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表述了自己的廉政思想，以《颜氏家训》为代表的家训文化也以独特的方式将廉政意识灌输给自己的子弟。诸葛亮的廉政实践和廉政理论是这一时期廉政文化的表率，而循吏羊续、是仪、苏琼、赵轨、辛公义等人则以自己的廉政实践将廉政理念作了最生动的诠释。

隋唐五代时期（581—96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个发展高峰。“盛

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成为继两汉之后的又一个发皇期，而且在当时的东亚乃至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齐鲁的思想文化领域再一次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推出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著作。其中，吕才带有强烈唯物论色彩的哲学思想，房玄龄、马周带有鲜明个性特点的开明的政治思想，孔颖达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刘晏“以人为本”“养民为先”的进步的经济思想，显示了齐鲁思想家在这一领域的实绩，奠定了他们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他们中的不少人作为官员有着廉政的实绩，而在思想上阐发的廉政理念则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廉政思想的宝库。

宋辽金元时期（960—1368年）的四个多世纪，中国经历了由北宋统一到宋与辽、金、西夏的对垒互峙，再到元的统一的历史演变。由于辽、金、西夏和元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给中国历史的发展注入了许多新的元素，而宋代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文化也创造了新的辉煌，其重要标志就是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所昭示的儒学的复兴。在这场儒学复兴运动中，泰山书院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和胡瑗起了肇始者的作用。后面两人虽然都不是山东人，但由于他们与石介和泰山书院联系在一起，他们自然也就作为泰山学派的领军人物归入齐鲁文化的创造者之列。由他们接续唐代疑经学派对汉儒繁琐章句训诂之学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批判，从而逐渐形成了宋儒“议论解经”和“疑经改经”的学风。他们在大力弘扬原始儒学关心国计民生和积极干预政治的基本精神的同时，特别注重开掘孟子思想的积极因素，进一步提升孟子在儒家代表人物中的地位，并在对释、道的猛烈批判中使儒学的理性原则和廉政思想得以高扬，而范仲淹、苏轼、辛弃疾、张养浩等人的廉政实践和廉政观念成为当时廉政文化的突出代表。1127年北宋灭亡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确立了在山东的统治。一方面，大量山东儒生南迁，对南宋理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一方面，留居原地的儒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儒学的传授和播扬，并通过从政对金朝的政策施加影响，使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汉人的苛政。1234年蒙古灭金后，山东先是在蒙古帝国，后来在元朝统治下度过了一百三十多年的艰苦岁月。这一时期，山东思想文化上的

最突出的成就是泰安长清（今山东长清）人严实创立的东平府学和由此形成的东平学派。这个学派的学者一边通过讲学活动传播儒学和培养人才，一边通过进入各级官府贯彻自己的从政理念，在元朝建立后五十多年间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和思想，使廉政理念在那个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双重变奏的岁月里仍能不绝如缕地得以延续和发展。

明清时期（1368—1911年），中国已经步入封建社会的后期。一方面，两朝，尤其是清朝，中国的疆域大大扩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几度繁荣，资本主义萌芽显著成长，中国的经济总量长期居于世界首位。另一方面，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强化，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已经发挥到极致。整个封建社会面临着不可挽回的没落局面，而当时成长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还不足以突破封建的经济结构，中国还不具备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条件。与此同时，欧洲的先进国家却日益加快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民族灾难就不可避免了。明朝（1368—1644年）统治者一直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明朝中期以后，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创立的“阳明心学”在社会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流风所及，以穆孔晖、王道、张后觉、孟秋为代表的山东学者与之呼应，形成了“山左王学”，在当时的思想学术界占有一定的地位。另外，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结他在战争实践中的经验，创立了颇具特色的军事廉政思想。于慎行、徐标、邢侗等人的思想中也都展示了鲜明的廉政意识。清朝统治（1644—1911年）时期，尽管程朱理学依然是官方推崇的统治思想，但由于明清之际改朝换代的巨变对知识分子的刺激，一批先进的思想家开始对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进行批判，由此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实学”思潮。山东学者张尔岐的经学研究、马驥的史学研究，就是对这一思潮的思想和学术上的回应。清朝中期，兴起了以对中国古典文献整理、考证、辨伪、辑佚为主要内容的“乾嘉之学”。山东学者对此也作了强有力的回应，桂馥、孔广森、郝懿行、牟庭、王筠等在经、史、文字、音韵、金石等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然而，由于他们故意规避对社会政治的关注，所以他们思想中的廉政意识只能曲折隐晦地表述。倒是在丁耀

亢、王士禛、李文藻、刘统勋父子、郑板桥、韩梦周、杨以增、徐金铭等人的廉政实践或著作中，透出他们对廉政的认识和理解。不过，应当承认，在明清时期，山东已经不是中国思想学术的中心，也没有产生在思想和学术上居于全国前列的领军人物。在廉政思想的创造方面，与先秦秦汉时代相比，就有些逊色了。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五帝和夏商西周时期的齐鲁廉政思想 / 1

一、概述 / 1

二、虞舜“明德”、严法的廉政意识 / 3

三、商汤和伊尹行政中的廉政理念 / 8

四、吕尚与早期齐学中的廉政观念 / 17

五、周公与早期鲁学中的廉政思想 / 21

第二章 春秋时期的齐鲁廉政思想 / 35

一、概述 / 35

二、管仲和《管子》的廉政理念 / 37

三、晏婴的廉政理念和廉政实践 / 43

四、季文子和公仪休的廉政观念和廉政实践 / 53

五、孔子“身正令行”的廉政理论 / 57

六、司马穰苴和孙武兵书中体现的廉政意识 / 70

七、《左传》和《国语》的廉政理念 / 74

第三章 战国时期的齐鲁廉政思想 / 84

一、概述 / 84

二、齐威王的廉政理念 / 86

三、墨家“节用”“节葬”的廉政意识 / 89

四、齐国稷下学派的廉政观念 / 93

五、孟子“仁政”思想中的廉政理论 / 102

六、吴起兵书中体现的廉政意识 / 114

七、孙臆兵书中体现的廉政意识 / 118

八、庄子空幻玄想的廉政意识 / 121

九、荀子礼、法结合的廉政理论 / 126

十、鲁仲连的廉政意识 / 136

第四章 秦汉时期的齐鲁廉政思想 / 140

一、概述 / 140

二、秦汉之际齐鲁儒生的廉政意识 / 143

三、西汉初年黄老之学的廉政意识 / 147

四、董仲舒新儒学的廉政理论 / 155

五、西汉齐鲁儒生的廉政意识 / 165

六、东方朔的廉政理念 / 172

七、郎顛和襄楷的廉政意识 / 174

八、何休和郑玄的廉政意识 / 177

九、徐干、仲长统社会批判思想中的廉政观念 / 184

十、董宣、刘宠、杨震、羊续的廉政观念和廉政实践 / 195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齐鲁廉政思想 / 208

一、概述 / 208

二、齐鲁世族与世族文化中的廉政意识 / 210

三、王肃、“荆州学派”的廉政意识 / 220

四、诸葛亮的廉政理论和廉政实践 / 224

五、魏晋时期齐鲁玄学家的廉政意识 / 230

六、王猛的廉政实践与廉政意识 / 233

七、萧道成的廉政理念和廉政措施 / 238

八、《颜氏家训》的廉政思想 / 240

九、循吏是仪、苏琼的廉政意识与廉政实践 / 244

第六章 隋唐五代的齐鲁廉政思想 / 250

一、概述 / 250

二、齐鲁世族的廉政意识与廉政实践 / 253

三、齐鲁庶族和房玄龄、马周、刘晏的廉政意识与廉政实践 / 262

第七章 宋辽金元时期的齐鲁廉政思想 / 274

一、概述 / 274

二、宋辽金时期齐鲁儒生的廉政意识 / 276

三、范仲淹的廉政理念和廉政实践 / 284

四、苏轼两任山东知州及其廉政思想 / 291

五、泰山学派的廉政观念 / 294

六、辛弃疾的廉政观念和廉政实践 / 301

七、元朝东平学派的廉政观念 / 304

八、张养浩的廉政思想 / 314

第八章 明清时期的齐鲁廉政思想 / 321

一、概述 / 321

二、明朝山左王门学派和清代实学思潮的廉政意识 / 323

三、戚继光兵学中的廉政意识 / 330

四、于慎行的廉政思想 / 337

五、邢侗、徐标、丁耀亢的廉政意识和廉政实践	/	341
六、李文藻、韩梦周、徐金铭的廉政意识和廉政实践	/	350
七、郑板桥的廉政观念和廉政实践	/	358
八、明清时期齐鲁文化世家的廉政思想和廉政实践	/	380
结 语	/	405